

先秦文化自觉的背景解读

刘益梅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文化总是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在对文化自觉的内涵进行解释的基础上,从先秦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天道观的变化以及礼乐文化的崩坏而导致的文化危机的角度,阐述了先秦文化自觉产生的历史动因。混乱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宇宙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先秦社会知识阶层中出现了“哲学的突破”,由此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想也开始了“去神秘化”的过程。

关键词 先秦;文化自觉;文化背景;哲学的突破;人文思潮

中图分类号:C 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1)03-0107-06

作为一种客观文化现象,文化自觉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应对内外危机的精神准备。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所处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所制约,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优秀的传统社会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工作中,应引导人们树立高尚的文化价值观,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历代优秀的社会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传统社会思想和文化,是实现文化自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也就是费孝通^[1]一直倡导的“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在建设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对先秦文化自觉的背景解读,有助于勾勒出先秦社会思想的发生与发展状况,认识先秦社会思想,对于今天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均具有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自觉的含义

费孝通^[1]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不是要“回归”,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也就是说,要有正确、健康的文化观。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又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更是一种文化实践。对于文化自觉的理解,我们不能仅仅认为它是文化领域的一种现象,

而应该把文化自觉的理念扩大到社会的发展中去。因为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与文化息息相关。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发展再到人们素质的提高等等,无不彰显着文化自觉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回首 20 世纪,人类所倡导的一系列文化观念,如从一元文化模式向多元文化模式的过渡,从阶级对立意识向全球意识的过渡,从征服自然的观念到倡导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等等,这一系列文化观念的认同无一不是人类自我意识自觉反思的结果。”^[2]把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相联系,不仅是一种理论需要,也是一种实践要求。

对文化自觉的理解,应该把它提高到对自然及社会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设计的高度来加以思考。所谓文化自觉,实际上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前途的一种理性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促使主体形成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人们自己意识到这种信念和准则,并且主动将之付诸实践。实践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所以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自觉不但应该根据社会的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同时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变革是文化自觉最根本的动力。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文化总是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经济矛盾和文化矛盾的运动与变革中。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演变,如果离开了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任何意义上的文化进步与自觉都是不可能的。“根据唯

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明确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3]477-478}文化自觉作为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作为现代化境遇的一种现实层面上的表现和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归根到底受生产力发展的支配和制约。文化自觉的内容也适应着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剧烈冲突是文化自觉的根本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天道观的变化以及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等等构成了先秦文化自觉的发展动力,促进了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先秦文化自觉的背景分析

1.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4]。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和推广,是社会生产力新发展的标志。早在商、周之际,中国就开始使用铁器。春秋时期,铁器已经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农业中开始出现了铁农具,铁器的使用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恩格斯^{[3]159}认为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

铁农具的出现使得在农业上比较广泛地使用牲畜成为可能。春秋时期,牛耕也渐次普及,“犁牛之子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犁牛就是耕牛。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普及,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农民,已经能够深耕熟耰,开渠筑坝,许多荒地开垦为良田。春秋战国各国不断地垦荒,使原来各国边境之间的空地大大减少,国与国之间紧密相连,出现了“邻邑相望”,“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孟子·公孙丑上》)的繁荣局面。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产品,诸侯及卿大夫不再满足于“籍田”所得而醉心于“私田”,出现了“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现象。公田杂草丛生,维莠骄骄,“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井田制日益崩溃。

私田的开垦、井田制的崩溃引起了诸侯国财政

的枯竭。为了维持国家财政收入的正常运转,统治者不得不改变赋税制度,开始对所有耕地(不论公田、私田)普遍征税,扩大税源。从公元前 685 年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到公元前 645 年晋国的“作爰田”,再到公元前 594 年鲁国的“初税亩”,都是将“藉公田”的集体劳役地租,改变为履亩而税的实物地租。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得贵族土地的私有产权得到了承认,农民的人身束缚进一步松弛。

2. 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

(1)爵位制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封建土地的兼并战争中,许多小领主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而渐渐没落,而大领主则“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诗·鲁颂·閟宫》)“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诗·大雅·假乐》)周天子渐渐失去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也在逐渐失去,各诸侯国也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周王室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生活日渐拮据,不得不放弃天子之尊,向诸侯伸手“求金”“求车”。原来建立于土地所有制上的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等级从属关系和爵位等级制,逐渐趋于紊乱。

在周天子权威衰落的同时,各大封区诸侯的权威极度膨胀,他们不但不听王命,不缴贡纳,而且出现了“天子下堂而见诸侯”的现象,形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此外在兼并战争中由武士转化而来的大夫,也渐渐在大诸侯的封疆以内,形成许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采邑,因而演成“狐裘龙茸,一国三公”的现象。西周初年建立起来的“王臣公,公臣大夫”的等级从属关系已经荡然无存。

伴随着等级从属关系的颠倒,爵位制也更加紊乱。诸侯爵位的授予已经不出于天子,而是诸侯自称。如“郑伯,男也”而称伯;晋,侯也,而称公;秦,伯也,而称公;楚,子也,而亦称公。其他许多小国,皆公侯伯子男随便自称。战国时期,则“大则以王,小则以霸。”(《孟子·滕文公下》)

(2)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在土地上直接耕种的庶人,一部分分化为独立的商人和贱奴。新兴商人“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孟子·万章下》)他们的身份也被固定下来,所谓“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商人与庶人一样,“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孟子·万章下》)然而战国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兴商人逐渐摆脱了庶人

的属性,而以新的土地所有者的资格,与封建领主平分政权。

与商人同时分化出来的贱奴并不参加生产劳动,而是供各级领主使用的家庭使役。他们的工作,大半都是各种贱役,但也有最少数人由贱奴而升为诸侯的臣僚,如“婴齐,鲁之常隶也。”(《左传·成公十六年》)当时的贱奴,都有称之为“丹书”的卖身契,“丹书”不焚,则贱奴的身份就永远不能解除。所以一旦贱奴取得一定的地位之后,常常要求主人焚毁“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

总之,爵位制的变化、新兴商人以及贱奴的出现,改组了当时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

3. 文化危机——周礼的“崩坏”

当一种人们赖以生存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或人们自觉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规范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开始受到人们怀疑或批判时,一些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因素就会介入人们的行为和社会活动中,并且与原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形成冲突,这样原有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就会陷入危机。一般来说,文化危机往往在两个层面上发生,一是在现实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上所发生的文化观念自觉或不自觉的冲突与裂变;二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包括知识精英及其政治精英对于这一现实的文化冲突所进行的自觉反思和检讨^[5]。先秦时期政治生活秩序的“礼崩乐坏”成了春秋后期的特征,社会的变迁推动着文化的变迁。

(1)西周的礼乐文化及其制约。礼乐文明是西周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的一体,它不仅从外在的制度上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而且还以伦理道德的形式对人的思想意识加以指导。从夏朝开始,历经商,以至于周,礼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都遵守礼制行事,其间虽有动乱与战争,而各地诸侯尚能尊王安土,安分尽职。然而公元前11世纪,“小邦周”战胜了“大邑商”之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形态也由商代的“祭祀文化”演变为西周的“礼乐文化”,人际礼仪的内容大量增加,人处在由各种礼仪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礼仪犹如一张社会大网,每个人都

被固定在由各种礼仪构造的社会关系之网中。

自从西周初年的周公“制礼作乐”起,“礼”与“乐”就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礼记·乐记》)乐启发人们的内在道德、精神、情感、审美等意识,建立一种内在心理的自觉性。从而,把外在的等级秩序转化为内在的等级观念,使人们能够心悦诚服地自觉遵循之,虔诚追求之,甚至达到陶醉其中,须臾难离的境界。

礼乐对人的规劝、引导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等级对个人的驯服过程。西周的礼乐文化在本质上已不是神的他律,而是立足于人的组织结构的礼的他律^[6]。它把各种社会关系通过相互的礼仪形式表现了出来。“礼仪是把民众束缚在一起的契约;一旦解除契约,民众便陷入混乱状态。”“为保持上等人的恬静和人们的良好秩序,没有比礼仪的规则更好的东西了。礼仪的规则不过是尊敬的原则的发展。”^[7]

(2)礼乐的崩坏。公元前770年,随着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王权制度的崩溃,诸侯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发展自己的实力,原有的礼制必然会被打乱,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全面瓦解,从而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周平王东迁后,实力不断强盛的诸侯藐视天子,自行礼乐征伐,史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国语·吴语》)周桓王后,诸侯几乎不再朝贡天子,也不祭祀王室宗庙。诸侯国内出现了“陪臣执国命”以及公庙设于私家的现象。“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天子、诸侯、大夫、陪臣关系的变动,打破了以往权力转移和利益分配的制度“礼”,改变了旧有的礼制秩序。随着礼制秩序的破坏,与礼相伴的乐也难以以为继,出现了“八佾舞于庭”“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论语·八佾》)等“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的局面。

社会文化的变迁使得西周津津乐道的礼制威仪全然改观。君对臣已无威仪,臣对君也不再畏而爱

之,固有的上下关系的失调使得上下规范不再有效,周礼的统治秩序面临解体。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成了时代的主题,“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战国策·刘向书录》)夏、商、周以来的旧制度、旧传统,已不可避免地趋于瓦解。

文化生活上的礼崩乐坏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恐慌。他们对于“自己是谁、处于何处以及要到何处去?”等问题产生了焦虑。人们脱节于旧有的传统,原来的世界观、价值观被颠覆了,从而形成了文化认同的危机。这种“认同危机”促进了士人的文化自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指出,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人类正是在努力应对自然环境与人为的挑战中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文明。挑战越大,回应也愈活跃^[8]。一般说来,文化的自我批判总发生在旧文化衰落时期,每当社会政治经济总危机处于爆发的前夜或已经爆发,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坏,于是一个文化批判时代,一个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的时代开始了。“礼乐文化”是我国夏商周以至春秋时代的文化标志,“礼崩乐坏”带来了“文化断裂”和文化危机,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思并由此而达于文化自觉。

三、先秦文化自觉发生的契机

春秋时期的历史时代,是一个危机和内乱共生、充满混乱的时代。在宗法秩序解体的过程中,以前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礼”已经不再具有约束力。社会关系的动摇促进了有识之士关于伦理与政治的深入思考,天命神意主宰人事吉凶祸福的观念遭到了根本的怀疑,人们开始倾向于把天神变成普通的隶属物,剥夺它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把思维的视角深入到人自身,重视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并以此来安排社会秩序。人们理性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为文化自觉提供了契机。

1. 精神权威的变革:人文思潮的兴起

人文思潮是相对于神明思想而言的以人为出发点对自然和社会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探讨的思想潮流。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人文思想的起源。礼乐文化所代表的文化模式,相对于殷商而言,神的色彩趋于淡化,人文的色彩逐渐明显。承继着西周文化的发展趋向,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逐渐忽视宗教信仰以及神秘力量对社会的约束而开始了对世界的理性

思考和探索。这种变化,既与当时的社会变动有关,也反映了精神的发展和自觉。

(1)天道远、人道迩:人文思潮的萌芽。殷周时期,上帝、天命观念占主导地位时,“天道”仅仅是一个附属于天命的宗教观念。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失去了对诸侯的统治,中央权威大大跌落,出现了“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现象。王室垄断的学术话语被分散,学术思想上出现了多元与争鸣的繁荣气象。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使天在智人的眼中丧失了至上权威。天道观在剧烈的政治变革中被迅速地世俗化,“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天神的支配权被否决了。

但是,天在形式上仍然被认为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终极来源,人间统治者的一切政治需要都通过天表达出来。《尚书·皋陶谟》指出:“……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人间政治治理所需要的“五典五惇”“五礼”“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通过“天秩”“天命”“天讨”的表达,获得了可能性与正当性,而其逻辑转换的枢纽就是——“天工,人其代之”。“世俗天道观”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代之”的方式沟通天人,天人相通,因此这时的天具有了某些人文主义的色彩。天道观的重大改革,对人们的思维具有重大的启发作用。

(2)民为神之主:人文思潮兴起的重要表现。春秋时期,人们反对以“天道”来贬低人的作用。“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思想的提出,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开始用天命来解释君权的来源,强调君权神授,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合法依据;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作用,人在“神”的面前不是完全被动的,神的旨意可以通过人而得到体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先民后神的思想表明旧的政治宗教信仰已经没有意义了。此后,“民为神主”的类似思想在不断得到阐发。如“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桓公六年》)否认天有意志,表达了其浓厚的人文意识。

虽然这些思想不是当时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民”“神”地位的倒置,已极大地冲击了正统的上帝神鬼观。人民已不是上帝神鬼的附庸,人民的愿望和向往,是真正代表神的意志的,没有民就无从去谈

论神。

(3)民本思想:人文思潮的理论阶段。在传统的天命神学理论受到挑战的基础上,人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价值标准,开始从“民”的角度考虑君权的合理性。“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公十四年》)百姓的得失、国家的安治是判断君主政权合理性的标准,如果君主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君主的统治地位自然就会动摇。史墨更是把君民关系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次,“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物生有两”表明事物都有对立面,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君臣地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条件就是能否治理好国家以及得到人民的拥护。君臣关系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已经全然摒弃对传统秩序和传统价值的温情,出现了礼制秩序解体的合理性认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进一步加深,标志着春秋时期的人文思潮已经上升到理论高度,反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朦胧觉醒。卡尔·曼海姆^[9]指出:“一般说来,怀疑主义产生于以群体为中心程度世界观的崩溃。对于一个世界观的确信有赖于其支持者的安全感,当个体在群体中的立足点开始变得不安全或这一群体的团结开始瓦解时,个体就开始怀疑该群体的既定的信念。”明确排斥神秘因素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全新的伦理政治思考形式和道德思考形式,预示着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的前兆。

2. 契机:哲学的突破

在历史的传统中,人们在意识的最底层形成了一个深幽的、被遮蔽的背景,以这个背景为支持的依托,人们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念和主体意识,这个观念会控制着人们对一切事物的判断与解释,从而赋予知识与思想的合理性。一旦支撑思想的依据崩溃了,知识与思想就会发生变化^{[10]41}。

西周末年剧烈的社会变迁肢解了封闭的文化垄断体系,王室中的文化官员开始外流,散入各诸侯国,甚至进入边远四夷之地。《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嚭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思想文化的下移,一方面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私人学术的形成;另一方面,加剧了诸侯国内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的转型,从而使得开始于西周末年的社会意识

形态内部的人文精神,终于可以跨出西周天命神学的神秘化笼罩,用理性主义的态度对自己的本质与使命进行冷静的反省。一向神圣的“昊天”“上帝”也越来越受到怀疑甚至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和诅咒。“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大雅·荡》)“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小雅·雨无正》)。理性的思考使得人们从宗法伦理和天命神权观念束缚下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开始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从而“在过去那种不证自明的思想体系上划出了一道道裂痕。”^{[10]84}旧有的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崩溃了。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宇宙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先秦社会知识阶层中出现了“哲学的突破”^[11]。

所谓“哲学的突破”是指对构成人类处境的宇宙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具体表现为中国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的“去神秘化”的理性过程。“神话时代与其心灵的平静和自明的真理终结了,过去那种无须思索的真理崩溃之后,人们不得不思索,过去那种神话时代的自信消失之后,人们不得不在理智的思索中重建自信,过去那些天地有序的观念倾斜之后,人们不得不在观察中重新修复宇宙的格局,在这一思想分裂的时代,人类才真的开始不完全依赖幻想的神明和自在的真理,而运用自己的理性。”^{[10]69}

先秦“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的“王官之学”而来的^{[11]21}。“王官之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官师合一”,王室的官吏既是官同时又是那门学术的传授者。官师守其典章,个别的“士”是不能据之为私有,更不能各就已见对礼乐传统加以发挥。但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的社会危机到来,这种“官师合一”和“政教一体”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了。对此,章学诚描述道:

“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文史道义·原道》)

3. 新的知识主体:“士”阶层的形成

先秦时期,真正在理性上完成足以与社会变革

相称的“文化突破”的社会力量,却是在社会变革中开始兴起的士人阶层。“士”作为一个阶层或群体最早出现在商、周时代。“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尚书·多士》)。但这一时期的“士”只是商、周社会等级制中的一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因为商周时期的“士”虽然以自己的脑力劳动在天子、诸侯、大夫各种行政机构中任职,但他们所拥有的业务知识只是局限在自己的专业知识范围,还没有以知识与社会进行劳动交换,“士”还没有自主性。直到春秋中后期,由于宗法制的破坏以及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使得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士人阶层。以孔子的出现为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诞生了。

新兴士人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了一种精神上、思想上乃至行为上的自觉与成熟。面对文化秩序上的“礼乐崩坏”、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学、“道术将为天下裂”以及“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的社会局面,他们著书立说,收徒讲学,发表自己的见解,于是有了儒、墨、道的不同思路,也有了各种数术方技家的不同技术,先秦出现了不同学派。《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

所善。以此之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的兴起改变了旧传统并且确立了新的思想形态,整个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地。

参 考 文 献

- [1]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7.
- [2] 邹广文. 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M]. 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4:18.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7-478.
- [4] 李瑞兰. 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589.
- [5] 衣俊卿. 文化哲学[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32.
- [6] 陈来.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M]. 北京:三联书店,2002:10.
- [7] [美] E. A. 罗斯. 社会控制[M]. 秦志勇,毛永政,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92.
- [8] 王磊. 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一种解读[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1):13-20.
- [9] [德] 卡尔·曼海姆. 卡尔·曼海姆精粹[M]. 徐彬,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3.
- [10]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84.
- [11]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Pre-Qin Period

LIU Yi-mei

(College of Sociolog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Culture i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historical stage and specific economic patterns.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rive of Pre-Qi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Qin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change of Heaven and the collapse of Courtesy and Music culture etc. Chaotic social reality forced people to form rational knowledge for the essence of universe. The “philosophy breakthrough” emerged among social intellectuals in pre-Qin period. Therefore, Chinese ancient social thoughts also started the “secular” process.

Key words the pre-Qin perio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background; philosophic breakthrough; humanistic thoughts

(责任编辑:刘少雷)